



西夏之学校与科举考释

廉 兵（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学校与科举是西夏向中原王朝学习的产物，是随着西夏社会的发展以及现实的需要而逐步完善的，在西夏文化与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对于西夏之文化建设，培养后备官僚行政人才，以及整个社会之稳定，贡献不浅。

【关键词】学校；科举；西夏；进士

学校之于中国，可谓源远流长。自汉武帝时设立官学，学校就成为历代政府培养后备官僚人才之基地，更是整个社会劝学及激励社会文化发展的源泉之一。作为潜心汉化，具有完备中国特色国家制度之西夏王朝，亦不例外。

西夏立国后，元昊既创西夏文字，自然要让国人学习，于西夏境内广泛推行。具体措施：

“冬十一月，设蕃汉二学院。元昊既制蕃书、遵为国字，凡国中艺文诂牒，尽易蕃书。于是，立蕃字、汉字二院。汉习正、草；蕃兼篆、隶。其秩与唐、宋翰林等。汉字掌中国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以蕃书并列；蕃字掌西蕃、回鹘、张掖、交河一切文字，并用新制国字，仍以各国蕃字副之。以国字在诸字之右，故蕃学院特重”。

可见元昊为了推广西夏文字之决心，而而对学术之重视，设立类似于中原王朝翰林院之类政府机构，然并非学校，没有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基地，番汉学院等政府机构的人才也难觅，故而称帝后第二年（公元1039年）：

“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以野利仁荣主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写以蕃书。于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并令诸州各署蕃学，设教授训之”。

野利仁荣为西夏文字之创制者。“蕃、汉官僚子弟内选俊秀者入学教之”可见党项、汉族子弟皆可入学，“俟习学成效，出题试问，观其所对精通，所书端正，量授官职”，可见学成后要量情授予官职。“蕃学”自然是培养西夏文人才，更是造就、选拔官吏的基地。

西夏前期虽然受汉文化特别是儒学的强大影响，但西夏境内的系统儒学教育仍然很不正规。60多年后，至崇宗时，国中由蕃学进而为官者诸州多至数百人，而汉学则很不景气，士人风气日坏，见：

“秋八月，始建国学。自曩霄创建蕃学，国中由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而汉学日坏。士皆尚气矜，鲜廉耻，甘罹文网，乾顺患之。御史中丞薛元礼上言：“士人之行，莫大乎孝廉；经国之模，莫重于儒学。昔元魏开基，周、齐继统，无不尊行儒教，崇尚《诗》、《书》，盖西北之遗风，不可以立教化也。景宗以神武建号，制蕃字以为程文，立蕃学以造人士，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今承平日久，而士不兴行，良由文教不明，汉学不重，则民乐贪顽之习，士无砥砺之心。董子所谓‘不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可得乎？”

于是乎：

“于是乾顺命于蕃学外特建国学，置教授，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廩食之”。

又见“建中靖国元年，乾顺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廩食之”。

“国学”在中原王朝早已有之，指国家最高学府，如太学、国子监等，是政府弘扬儒学之所在。西夏地处西方，又是少如民族当政，最高学府也是国学，其主旨自亦是弘扬汉学。不难想象，此举既是西夏文化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也是境内调整番汉关系的重要措施。从此西夏建学崇儒，储备人才，使西夏走上番汉并重的道路，并为仁宗时期大力发展儒学，开办多种类型的儒学教育打下了基础。

仁宗时期，学校更是大规模发展，无论是儒学的提倡，还是人才的培养，都与以前不可同日而语。见：

“绍兴十四年、夏人庆元年（公元1144年）六月，令州县各立学校。国中增弟子员至三千人。复立小学于禁中。凡宗室子孙七岁到十五岁皆得入学。设教授，仁孝与后罔氏亦时为条教训导之”。

仁宗通过这样的途径，使皇室子孙有了更为优越的条件学习儒学和礼法。为将来进入统治者的行列打下基础。又“令州县各立学校。国中增弟子员至三千人”，等于崇宗最初建立国学时设弟子员的十倍。又：

“绍兴十五年、夏人庆二年秋七月，初立太学，国主亲视之。立大汉太学，仁孝亲释奠，赐予有差”。

而《西夏书事》之作者吴广成对此推崇备至，见：

“昔董子言：“养士莫大于太学。”太学者，人材之系，教化之原也。故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可得矣。仁孝生长西蕃，先立学校以教于国；复设小学以化于官；又慕大汉休风，特起太学，亲临释奠，虽古贤主何以加！兹书“初立”，志其始也；书“亲视”，表其诚也。可见兴建太学之重大意义。进而：

“绍兴十六年、夏人庆三年三月，尊孔子为文宣帝。令州郡悉立庙祀，殿庭宏敞，并如帝制”。

对于儒学之代表人物孔子之表彰，可见儒学在西夏之势力。

“立大汉太学”、仁孝亲临太学祭奠先圣先师孔子。从国中普遍设立学校，进而在宫中建立小学，继而在京城建立学习汉文化的最高学府，这些推进儒学的盛事在短短的两年内完成，可见仁宗时儒学发展之迅速，学校教育之兴盛。又：

“绍兴十七年、夏人庆四年秋八月，策举人。立唱名法，复设童子科。于是，取士日甚”。

可见西夏按照中原王朝之方式开科取士，进一步推动西夏儒学与学校之发展。又：

“绍兴十八年、夏人庆五年，三月，建内学。仁孝亲选名儒主之。史臣曰：“自乾顺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仁孝增至三千人，尊孔子以帝号，设科取士，又置太学、内学，选名儒训导。观其立纲陈纪，传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

可见西夏之学校与科举制度之完备及进一步发展。以至于引起一些权臣之反感与排斥，如：

“绍兴三十年、夏天盛十二年冬十月，任得敬请废学校。得敬凌虐朝士，见仁孝尊崇儒学，深恶之。上言：“经国在乎节俭，化俗贵有权衡。我国介在戎夷，地瘠民贫，耕获甚少。今设多士以任其滥竿，糜廩禄以恣其冗食，所费何资乎？盖此中国之法难以行于我国者，望陛下一切罢之。”仁孝不报”。

但仁孝不同意，安之如素。可见西夏和中原地区一样，也推行庙学，即在学校建立圣庙，成为学校的典范，使庙学一体，以达到推行儒学的目的。

西夏推行尊师重道，西夏法典把学校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定为上下关系，把杀害老师定为“十恶罪”：

“弟子、学生等对官家所派师傅、先生打斗而杀时，当与杀诸司同分人上属大人、承旨之罪相同”。

西夏如此推行儒学，在国内广泛设立学校，实行科举制度。西夏国内自然会人才辈出。如：

“三月，策士，赐宗室遵项进士及第。遵项，齐王彦忠子。彦忠材器英敏，善骑射，饶武略，遇事敢为。任得敬害其能，中以蜚语，贬守凉州。在郡有政绩，蕃、汉畏怀。得敬诛，召入为马步军太尉。卒，谥忠武。遵项端重明粹，少力学，长博通群书，工隶篆。纯佑廷试进士，唱名第一，令嗣齐王爵。未几擢大都督府主”。

遵项是齐王彦忠之子，少年好学，长大博通群书，长于隶篆书法，后为西夏第八代皇帝。而1203年进士及第，唱名第一。

“德基，金贞初进士，守官边邑。夏兵攻其城，德基坐厅事，积薪其旁，谓家人曰：“城破即焚我。”及城破，家人不忍，遂被执。遵项胁之跪，不屈。有故人从旁解曰：“此人病狂，故敢如此。”德基曰：“为臣子当如此，吾岂狂耶？”40系诸狱，他日召问，德基终不屈，大骂曰：“吾岂苟生者哉！”遂

>>（下转第339页下）



数字经济带给会计要素的变革

董 雪(哈尔滨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6)

【摘要】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对企业而言,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资源是知识资本,采用非货币手段取代原有会计计量模式来计量知识资本势在必行,相应地资产计量的重心必将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转移,人力资源必将纳入财务报表体系。

【关键词】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非货币手段;人力资源

会计要素是指根据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特征所确定的财务会计对象的基本分类。会计要素是对会计对象的具体化,那么会计要素必须能够完全反映会计对象,也就是反映企业的全部资金运动。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科学技术作为一种崭新的生产要素被应用到生产领域,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互联网的产生及发展将人类带入以网络经济为代表的知识经济时代,相应的财务会计原有的概念、原则和理论受到极大地冲击,其中会计要素作为会计信息系统的基本单位则首当其冲。我国新会计准则中把会计要素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资产负债表要素,包括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这个分类与国际上各准则制定机构基本一致;第二类是收益表要素,包括收入、费用、利润,这与国际上各分类情况存在一定差异。

一般来说,原始成本会计下的计量单位是货币,并且假设当前货币的币值稳定不变。原始成本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是以有形资产的计量为核心的,并且建立在传统工业经济基础上。与此同时,在工业经济时代,机器设备、厂房、原材料、劳动力这些最主要的资本形态可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找到其货币价格,那么以货币为单位作为计量属性就可以向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提供相关的信息。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代替物质资本成为企业最重要和最富潜力的核心资源,例如企业品牌、顾客名单、专利权、特许权、版权、人力资源、企业商誉、营销网络、管理战略等。无形资产的取得都不是以有形的方式和以市场为基础的。这些资本通常很难用货币计量或者说原始成本会计无法合理公平地计量它们。会计作为一个提供和反映信息为主的信息系统,企业要想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使用这些重要的会计信息去反映市场行情,因此选择非货币计量单位来反映与企业知识资本相关信息显得势在必行。

从另一角度讲,在知识经济时代到来之前,人们通过手工对信息进行收集、加工、整理,而且披露财务信息的方式相对单一,所以传统会计原则限制了向投资者和决策者提供大量真实可靠、有助于决策的非货币信息。由于知识经济时代的繁荣发展,人们借助网络可实现的信息的完全共享以及计算机具有一系列优势功能,为用非货币手段来计量会计要素提供了条件。

企业取得资产后,原始成本会计需将原始成本系统地分配于资产使用期间,通常采用计提折旧或摊销的方式以达到符合配比原则的目的。这种计量模式对以物质资本为主导的工业经济时代来说是科学合理的,因为有形资产的价值大多会随时间的流逝而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供应空间往往受到有限的储存总量的限制,然而知识资本作为一种无形资产,虽然它是稀缺的,但它的供应空间却是无限的。与此同时,知识资产不会伴随着企业对其占有和使用从而被减少或磨损,恰恰相反企业通过知识资产来转化商品以使企业累积资本,更重要的是它有助于提高企业整体技术水平,从而使过去落后的技术转化为先进的发达技术,而企业

杀之”。

“鼎雄,凉州人,天庆中举进士,以文学名授翰林学士。安全篡逆,弃官入青岩山不出。遵项立,召为左枢密使。尝奉使谢金横赐,与接伴争相见仪,金人服其论正。及进吏部,气宇肃然,抑侥幸,拔淹滞,虽在乱离中,无敢干以私者”。

“宝庆二年、夏乾定三年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智耀,右丞相良惠孙。见国事殷,不愿受职,后隐贺兰山”。

可见西夏儒学熏陶之下的精英,科举制度下之宠儿对国家之忠烈。西夏在国内西夏推行儒学,广泛设立学校,实行科举制度

对有形资产的使用必将导致这些资产的消耗。所以采用计量有形资产的会计计量模式来计量知识资产显然是不合常理的。

会计要素包含内容及其计量的变革主要是:

1、资产重心的变革

在知识经济背景下实现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转移,企业资产=有形资产+知识资本,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消耗知识资本,企业竞争的实质是知识资本的竞争。企业所有无形资产的总和构成了知识资本,知识资本成为企业正常运转最关键的因素。无形资产的计量与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及其相关主体的利益息息相关。因此,资产计量的重心必将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转移。

2、人力资源纳入财务报表体系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世界的竞争从自然资源的竞争过度到人力资源的竞争,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主导的知识载体和科技技术的竞争。在以知识为基础和以智力为资源的时代,人才智力的成本 and 价值的确认、计量和记录,收益和权益的分配成为会计适应社会变迁的重要趋势,人力资源必将纳入财务报表体系,人力资源会计将成为人们研究会计的重要课题。因为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最具价值和最重要的资本就是知识和智力即知识资本,不再是过去的物质资本。知识经济的发展直接依赖于人的智慧、创新能力以及知识和有效信息最大化利用。在未来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人才将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人的智慧和创新将成为全社会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资源和财富。

知识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当前会计环境的变迁,因此,相应的权益理论的修正势在必行。会计目标是向有关信息使用者提供他们进行决策的相关信息,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相关信息的内涵和外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信息使用者要求企业披露所拥有的知识资本如企业品牌、知识产权等有利于保持企业长期战略性竞争优势的信息。通常决定一个企业良好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企业所掌握的知识技术和管理思想。会计作为一个信息系统,应该及时做出调整以便向信息使用者提供有关人力资源的信息。会计的对象是价值增值运动,在知识经济大环境下,价值增值的方式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人力资源对价值增值过程的贡献已经逐渐替代了物质资本。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会计对象应该能够及时将人力资源这一价值增值的会计要素纳入会计范畴。

总之,会计的基本假设、会计目标、会计对象三者共同作用决定了会计应该设置哪些要素以更好地满足使用者的信息需求。既然会计环境的变迁要求人们融入新的内涵,那么权益理论也应将人力资源这一会计要素容纳再内。为此,权益理论应该拓展为“企业总资产=财务负债+人力负债+财务资本权益+人力资本权益”。

【参考文献】

- [1] 张文贤. 人力资源会计[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 [2] 吕玉芹, 李清华. 基础会计[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之收效,于斯可见。

到西夏灭亡前夕,“学习列于郡邑,设进士科以取士”,真是西夏灭亡前夕教育、科举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 [1] [清]吴广成. 西夏书事[M].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5.
-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3] 史金波, 聂鸿音, 白滨. 天圣改旧新定律令[M].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0.
- [4] [元]虞集. 道园学古录[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05.
- [5]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 (上接第338页)